

清宣统年间北京城内人口死亡情况的分析

郭松义

【提要】 本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宣统元年、二年北京灵柩出城登记呈报书记录的资料,并结合其他史料,对这一时期北京年人口死亡数、死亡率、不同年龄段男女死亡比例等,做了大致的测定。鉴于登录的人口死亡原因中,痲症等传染性疾病占有主导的位置;在中青年妇女中,月经病和因做产导致死亡的占有相当的比重;而婴幼儿的死亡,除瘟症、痧症外,惊风、喉症、天花等,都是主要的杀手,从而看出当时北京的医疗和卫生保健,尚处于被动、缺少预防的状态。

【作者】 郭松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步军统领衙门·稽查守卫类全宗(第4、5卷)”档案中,存有宣统元年(1909)、二年(1910)北京灵柩出城登记呈报书共170件,记录了2718例个人死亡资料。尽管这两两年中的多数月份和多数日子已丢失,但由于所存样本数量可观,登录了包括死者姓名、性别、年龄、住址和死亡原因等各类目。所以通过资料,可以估算出北京城内日最高死亡人数和最低死亡人数,不同季节的死亡概况,以及年死亡数与死亡率。此外,从死亡年龄和死亡原因中,还能统计出不同年龄段的男女死亡数,了解当时北京的疾病卫生状况。这不但对研究人口史,而且对研究社会史,均具有重要的价值。下面根据档案所载,就上述内容分别加以讨论。

一、呈报册的格式和大体内容

据光绪《大清会典》记载:步军统领衙门(全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衙门),设统领1人,武职正一品,下置左翼和右翼总翼尉。步军统领的职责是“掌九门之管钥,统率八旗步军、京营马步兵,颁其禁令,以肃清辇毂”^①。这里九门是指北京的正阳、崇文、宣武、朝阳、阜城、东直、西直、安定、德胜九门。九门以内,属于内城。这里不但居住着皇帝、亲贵,也分防部署着八旗军丁及眷口,守卫任务最重。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实行官制改革,于中央设巡警部(后改内政部),又在北京置内城和外城巡警总厅。但因清廷没有明令将原属步军统领衙门的保警部分责职,相应移交于巡警总厅,所以类似像登录灵柩出入等事,仍掌握在由衙门两翼所属的各城城门领(城门吏)手里。城门领系从四品官,其中内九门每门2人,外七门(即东便、西便、广渠、广安、左安、右安、永定门)每门1人,具体负责城门启闭和稽查人员往来,同时包括灵柩出入时的登录事宜。笔者所使用的档案,就是各城城门领按统一规格,将每日抬出城门殡葬的死者情况逐个登载,呈报于左翼或右翼翼尉,然后再由翼尉汇总,或合两翼翼尉、或由各翼尉分头送呈步军统领衙门存储备查的文件^②。

至于文件的形式和书写内容,且举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二日由左右两翼翼尉合同呈报书为例:

^① 光绪《大清会典》,卷87,第12页。

^② 大致在宣统元年四、五月以前,都由两翼翼尉合同呈报,以后便改为分头呈报。

票

左翼翼尉鹤春等谨禀。为禀报事。窃职等两翼于闰二月初二日据内外城门领等禀报，所有出城灵柩分晰后呈阅。计开：

左翼所属：

安定门城门领达春布禀报并无出城灵柩

东直门城门领成瑞禀报

崔左氏一口 年三十二岁 因吐血身死 住什锦花园

.....

崇文门城门领全福禀报

刘二姑娘一口 年十三岁 因瘟疫身死 住乾面胡同

.....

文氏一口 年二十九岁 因产后身死 住班大人胡同

.....

广渠门城门领文龄禀报

文氏一口 年二十九岁 因产后身死 住班大人胡同

.....

以上各门出城灵柩男九名 女四口

右翼所属

德胜门城门领禧清禀报

.....

以上各门出城灵柩男三名 女三口

两翼各门共出城灵柩男十二名 女七口

宣统元年闰二月 日

在列举的呈报书中，出现了同样的两次文氏之名，先登录于出崇文门，再载于出广渠门。这是因为左翼的崇文门和右翼的宣武门，与其他各门不一样^①。从那些门出城便是郊外，而崇文、宣武二门，既连着内城，紧接着又是外城。若由此二门下葬于郊区，必得就近再出一门，如崇文门外的广渠、东便、左安或永定等门；右翼出宣武门后再经广安、西便、右安等门。这便是一个文氏，在崇文、广渠二门都有登录的原因。但也不是所有灵柩都是如此。原来那时的外城，除靠近前三门的中城一带街市繁华，商号、会馆和游娱乐场所林立，再南和城边的很多地方仍是荒僻空旷，苇塘园田相间。清朝政府曾在永定门内的香厂、金台书院前，右安门内圣贤庙东，广安门内老君地、报国寺后、潘家地，以及崇文门外的文昌宫前和金鱼池等处，设置义塚，以方便无力买地莹葬的贫苦人家和就近抬埋无名尸体^②。也有的因造坟不及，或因其他缘故，需暂停灵柩于家庙、庵观的，他们也往往就近选择在外城静僻地区。若凡此等灵柩，便不会出现一名两登的事了。

在呈报书中，绝大多数灵柩在出门时，都登录了死者的姓名、性别、年岁、死亡原因和家庭住址，但也有少数例外。如宣统元年三月十九日左、右翼翼尉福寿、吉陞的呈报书中列有：

东直门城门领德斌禀报

任辅一名 在法部监内病故抬埋

无名男子一名 在北新桥经检察厅相验准其抬埋

① 同样情况的还有中门正阳门，但按清朝规制，除皇帝等大丧，一般灵柩不得由此而出。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36，第14页。

.....

魏幅升一名 在大理院病故抬埋

上列任辅在法部监内病故抬埋,魏幅升在大理院病故抬埋,指的是在监犯人。当时监狱的生活条件普遍恶劣,加上狱吏冷酷薄待,监毙犯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①。他们中有的因无家人亲属领尸,便由官府直接派人抬埋,在出城时,抬尸人除报姓名、性别,忌讳填写死亡原因。类似此等情况的还有像宣统元年六月初八日右翼试署翼尉吉陞呈报的:“伊兴阿一名,在养济院病故”;十月二十九日呈报:“陆德山一名,系教养院病故”;宣统二年三月十一日呈报:“化秃子一名,因病在习艺所病故”等。养济院、教养院或习艺所,是收容孤寡残笃人员,或犯有轻微罪行进行劳动教习的场所。他们尽管在性质上与在监人员不同,但都是被轻视者,所以死后,一般也由所在院、所草草抬埋,并不填报年龄和具体病因。至于死于街头的尸体,往往不是求乞流浪者,就是外地来京的贫苦无依人员。如宣统二年五月初二日右翼署翼尉吉陞呈报的:“樊李氏、幼女无名氏二口,巡警高长顺跟随抬埋”。樊李氏并无名幼女,很可能是母女二人,因贫病或贫饿致死的。这些人死去被人报官后,经常无法检索姓名、原住址。检验人员也不细查死亡原因。这是在抬经城门时,守门人员只填写“无名男子一名”、“无名女子一口,经检察厅相验,准其抬埋”的缘故。在统共2718名死亡人员中,因各种缘故监毙于狱中的人犯共28人,死于教养院、养济院和习艺所的12人,死于街头屋旁的无名尸34名。

在档案中,不具体填报名姓、住址、死因的,还有教民的灵柩。这里说的教民,系指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民众。像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一日出阜城门的灵柩中,就记录了“西什库教堂灵柩四口”;同年六月初八日出阜城门的又有“西什库教堂灵柩三口”;宣统二年五月初一日出德胜门的有“北堂教友一名”等。义和团事件后,外国教会、教士在中国享有更多的特权,清朝官员一般不敢招惹。教民死亡,在教堂履行仪式后,举丧出城,不报名姓、住址、病因,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样的灵柩统共有19具。此外,病故于医院的死者,出城时也可不报病因、住址。如宣统元年六月十三日“李禄和一名,在养病院身死,相验抬埋”;十月二十九日“张姓一名,在美国医院身故抬埋”等。再就是高身份家庭的灵柩,常有不报死因、年龄的。如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那桐的母亲灵柩出城时,呈报书只开具“那中堂母一口”,其他栏目均缺。不过也不都是如此。宣统二年五月初三日出东直门的灵柩中记:“郡王福晋一口,年五十岁,肝气,住三条胡同”,报录就十分完全。

基于上述情况,在下面的统计中,如涉及死亡人数、性别、死亡年龄和死亡原因时,各个数字就不会完全相同。

此外,各城城门领逐日登录呈报的灵柩出入数,不等于、至少不完全是当日的死亡人数。按照中国或北京的传统习俗,人死后需经停尸、入殓、停柩,然后才择日起灵出殡这样几个阶段。所以从死到殡,少则得花两三天,也有四五天到六七天的,长的可拖至49天。不过这得取决于各人身份和家庭经济条件。一般说来,若是正常死亡,家庭地位高,生活又稍宽裕,能花费得起,停柩时间就会稍长;贫苦家庭的灵柩无法滞留太久。至于在监狱病故、或露死于街头者,一经发现,就得找人处理,特别是夏季,更不能拖沓延误。因此,档案中记录的出城灵柩数和当日死亡人数,两者有一定的差别,不过除少数外,双方相隔时间不会太长。

二、呈报册登录的死亡人数

先将我们掌握的死亡人数,按灵柩登录日为准,逐月分男女进行列表(见表1)。由于档案的残缺,除月份、天数不全外,还有一些日子只存右翼翼尉呈报数,另一些则存左翼翼尉呈报数,也有少

① 笔者曾有机会翻阅过清代2000多个刑事案件,据初步统计,每10~15个长期在监犯人中,约有1~2人未等刑满或在押未判,就以病故呈报死亡的。

数连左翼或右翼各门数也登录不全,真的能完整反映灵柩出城天数的一共才 70 天。若适当权加通融,如把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六日左翼翼尉呈报数和第二天的右翼翼尉呈报数归并为 1 天;宣统二年五月十九的左翼翼尉呈报数和二十日右翼翼尉呈报数合并为 1 天,照此计算,大体可增加到 91 天,除去日子相隔太远或数字残缺不全的 15 天、77 名死亡者,能够归类计算的死亡数是 2 641 人,其中由内城抬出的灵柩数、亦即死亡人数为 2 106 人,直接自外城抬出的即死亡人数为 535 人。

为了推算宣统年间北京全年死亡人数和死亡率,还必须搞清几个基本数字。

最重要是当时北京城内的人口数。据有的学者考订,宣统二年除城属周边不计,共有 136 708 户,785 442 口,其中九门以内的内城地区 84 482 户,468 970 口;前三门以外的外城(外七门以内)地区 5 226 户,316 472 口(韩光辉,1996)。以上所列,均系八旗册籍和民人保甲册中有名的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居住时间较长的外地流动人口。这些人在北京户口册籍中无名无姓,而且有的工作也不稳定(如临时打工者),还经常流进流出,但确有相当部分人因为从事的劳作,系八旗军丁家口和在籍百姓所依藉,如抬轿、赶车、拉水、背煤,以及各种长工、短工等,成为北京人口职业构成中不可缺少的

成分。譬如我们在呈报书中见到的无名尸,多数是这些人,所以在计算人口时,应加以考虑。那么这样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呢?据 18 世纪初有人在给皇帝的上疏中说:“通京城内,饷口游民有数十万”^①。“数十万”显然太夸大了,真正相对定居的也就是 10 万上下,宣统间亦大体相同。这 10 万人中,假定 3 万人居于内城;3 万人居于外城;另有 4 万人居于城外周边地区,那么,内城的人口便是 498 970 口,外城 346 472 口。以人口数论,内城比外城多出 15 万余口,就是说,外城人口相当于内城的 69.44%,可从抬出的灵柩计算死亡人数,外城只等于内城的 25%。这当然不会是外城的实际死亡人口。当时,外城虽有中城的商业区和为数不少的士宦宅第,但北京下层贫民很多居住于外城。他们的生活条件恶劣,平均死亡率只会高于内城。这就是说,在外城的死亡者中,相当一部分灵柩没有出城,就近选择南城和城边空旷地立坟埋葬了,从而无法在呈报书中见到他们的姓名。

基于以上说法,如果按外城人口相当于内城的 69.44%来计算外城的死亡数,得出的便是 1 462 人。在这 1 462 人中,出城埋葬的有 535 人,另有 927 人葬于外城城内。

将列表记录的内城死亡数 2 106 人和根据比例计算得出的外城死亡数 1 462 人相加,等于 3 568 人,这就是 91 天里北京城内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天死亡 39 人。在无法找到其他更精确数字之前,可把这 39 人作为年平均日抬出城外的灵柩数。按呈报书,这些出城的灵柩都是以传统农历记录的。宣统元年恰逢闰二月,全年 384 天;宣统二年系平年,354 天,两年合计 738 天,比公历 1 年 365 天,两年 730 天,多出 8 天,在此,我们仍照现行习惯用公历 365 天为 1 年。不过因日平均死亡 39 人是指抬出的灵柩,而当时人们出殡,除特殊者外,都要选日子,至少像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到初五、元宵、中秋以及其他不宜出门动土日,是不会出殡的,如此算来,一年不过 350 天左右。若以平均 39 人

表 1 北京出城灵柩统计 具

时间	天数	男性	女性	合计
宣统元年				
闰二月	16	264	245	509
三月	7	126	99	225
四月	1	10	5	15
五月	6	36	44	80
六月	12	153	152	305
八月	10	83	83	166
十月	9	102	93	195
十一月	2	16	14	30
宣统二年				
正月	5	82	82	164
二月	3	51	57	108
三月	15	218	235	453
四月	6	70	81	151
五月	14	161	156	317
合计	106	1 372	1 346	2 718

① 《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133 页；另见周祚显：《驱游惰以归本业疏》，《皇清奏议》，卷 24。

乘以 350 天,北京城内年死亡人数应为 13 650 人。年死亡率为: $\frac{13\ 650}{845\ 442} \times 1000 = 16.14\%$ 。然而这个数字还需进行修正。

三、死亡年龄统计

在呈报书中,有 2 571 人记有死亡年龄,其中男性 1 277 人,女性 1 294 人(见表 2)。

在近代医疗卫生事业普及以前,婴幼儿、特别是婴儿死亡率之高,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根据笔者对清代 135 个绅士的子女生育、死亡数的统计。在 976 个子女中,有 244 人在 0~4 岁时死亡,占其总数的 25%。应该说,这个数字极不完全。除因忌讳有意不加记录外,有的如

表 2 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统计

年龄组 (岁)	男 性		女 性		合 计		内城死亡人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0~4	80	6.26	58	4.48	138	5.37	134	6.49
5~9	42	3.29	51	3.94	93	3.62	88	4.26
10~14	43	3.37	50	3.86	93	3.62	78	3.78
15~19	78	6.11	87	6.72	165	6.42	135	6.54
20~24	64	5.01	128	9.90	192	7.47	150	7.26
25~29	59	4.62	112	8.66	171	6.65	137	6.63
30~34	64	5.01	91	7.03	155	6.03	127	6.15
35~39	93	7.28	81	6.26	174	6.77	141	6.23
40~44	88	6.90	56	4.33	144	5.60	115	5.57
45~49	116	9.08	74	5.72	190	7.39	133	6.44
50~54	108	8.46	61	4.71	169	6.57	128	6.20
55~59	145	11.35	61	4.71	206	8.01	155	7.51
60~64	114	8.93	99	7.65	213	8.28	171	8.28
65~69	85	6.66	115	8.89	200	7.78	155	7.51
70~74	55	4.31	68	5.26	123	4.78	100	4.84
75~79	34	2.66	60	4.64	94	3.66	75	3.63
80~84	5	0.39	26	2.01	31	1.21	27	1.31
85~89	3	0.23	10	0.77	13	0.50	11	0.53
90+	1	0.08	6	0.46	7	0.27	5	0.24
合 计	1 277	100	1 294	100	2 571	100	2 065	100

魏象枢自称:“壮年所生子皆夭殇,四十外甫生此子”^①;纪昀妾郭氏“生数子皆不育”^②。他们虽都有早夭子女,但因无确切数字而无法加以统计。有的学者就清代皇室家谱《玉牒》的记载,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到乾隆六十年(1795)的 80 年间,北京男性皇族死亡人数共 1 375 人,其中 0~4 岁的死亡者有 499 人,占整个死亡人数的 36.3%;又通过对后金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到雍正十一年(1743)的 128 年 1 755 名皇族女子、道光十七年(1837)到咸丰十一年(1861)的 24 年 1 340 名皇族女子死亡年龄的统计,前者 0~4 岁死亡

的有 706 人,占 40.4%,后者是 846 人,其比例竟高达 63.1%(鞠德远,1988)。一般说来,皇室子弟的生活和卫生医疗条件应优于普通市民,但从死亡比例来看,却比平民有过之,尤其是后一时期的女婴死亡,简直不可思议。虽然我们无法根据上述事例,对这一时期北京 0~4 岁婴幼儿死亡比例进行推算,但至少说明,表 2 中 0~4 岁婴幼儿死亡数要远少于实际数。之所以会有如此差错,应与步军统领衙门规定的登记制度和百姓对婴幼儿死亡的处理习惯存在着距离有关。各城城门领登记上报的,都是指出殡灵柩,而婴幼儿尸体除少数体面人家,通常不装棺材,而且也不发丧张扬。因为是孩子,个子小,有的用衣被一裹抱出城去埋了,更多的是穷人家的孩子,用蒲包草席,包卷后扛出城外。这种悄悄的做法,使守城官兵很难觉察,即使知道了,因非灵柩,一般也不登记,通融放行出去。这就造成 0~4 岁(可能还包括少数 5~6 岁的孩子)婴幼儿很多死亡无记录的缘故。

① 《寒松堂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954 页。

② 《纪晓岚文集》,第三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349 页。

按照表2,除0~4岁不计,各年龄段中,大体34岁以前女性死亡比例要高于男性,特别是20~29岁组,女性死亡比例比男性高出将近1倍。这可能与此年龄段的女子正处于生育旺盛时期有很大关系。自35岁以后,男性的死亡比例逐渐高于女性。这在妇女是因为度过了生育高峰,可专注于家务,心态相对平稳。男子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因独立承担家庭生计,面对复杂的社会风浪,精神压力加大,致使死亡率也相应增加了。到70岁后,女性死亡比例又开始高于男性,说明女性的总体寿命要高出男性。北京的这个男女死亡年龄结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少与笔者(1987)根据家谱所作的统计趋向是一致的。

死亡的季节性也是历史人口学界所经常关注的。刘翠溶(1992)通过对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台湾等省的20个家谱有关记录的考察,显示出死亡除受灾害、疾病影响外,在不同地区其结果常不一致。在北京,宣统元、二两年无明显流行性传染疾病,此外,自然灾害对民生所造成的影响亦不如农村强烈,所以季节性死亡的差异亦属于自然型。从可见的样本中,宣统元、二年北京死亡人数最高的是在冬天。据这两年正月、二月和闰二月的21个完整天的数字,平均日出殡灵柩达到34.76具,然后逐步下降,三四月(20天计)为29.5具,五六月份(23天计)为25.78具。其余据尚存资料,八月份8天,平均出殡数20.75具;十一月9天,平均21.67具。看来北京冬季严寒,加之一般家庭御寒条件差,是造成人们死亡偏高的重要原因,其中尤以老人为最明显^①。

四、死亡原因分析

在呈报书中,除前面说到的一部分不填写死亡原因者外,有2546人具体记录了死因。其中以投河、泡水缸、自抹、吞鸦片、服毒等方式自杀而死的13人(男性3人,女性10人),女性自杀的比例高于男性。值得注意的在这10名自杀女性中,有一叫英王氏的23岁旗人妇女,系丈夫去世后,紧随“殉节身死”。关于夫亡妻殉,清朝政府早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就下诏禁止,理由是人命至重大,“轻生从死,反常之事也,若更从而旌异之,则死亡者益众矣”。^②但因当时社会的道德趋向是哀美女子“随夫从一”,所以殉节之事仍时有所闻。这位英王氏的自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现实。

因意外伤害致死的有5人,其中4人属于事故。如宣统二年闰二月二十一阜城门城门领保林禀报:“永亮一名,年三十六岁,因堕马伤内身故”;同年月二十三日广渠门城门领文龄禀报:“刘魁云一名,因刨土沟压伤身故”等;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日,东直门城门领德斌报:“李明一名,内城总厅报霍有谋杀,李明一案,经检查厅验明抬埋”。至于霍有何要谋害李明,使用何种手段杀死对方,因事关人命要案,不在城门领登录内容之列,故无由得知。

在涉及死亡原因中,还有6名男子和1名女子是基于戒烟(鸦片)去世。清廷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不但外国鸦片堂而皇之进入中国,而且还在国内有规模地种植鸦片,使鸦片之祸愈演愈烈。这些因戒烟而死的人,有的鉴于家财耗尽烟资无措,有的迫于家庭压力,或出于自省,决心摒弃鸦片,可惜烟瘾已深,摧毁了原本尚称壮实的身体,加上戒绝方法不当,引发其他疾病,最后导致死亡。

在填报死亡原因的2521人中,99%是由于疾病而亡^③。当时尽管具有现代医学概念的医学理论已经传入中国,由美国人创立的协和医院已在北京开张并接受病人。前面提到有的灵柩出城时,登录了其人是死于美国医院便是。呈报书中填写的某些疾病名称,像霍乱、痢疾之类,也与现代

① 在上述正月、二月和闰二月的21天中,总死亡人数730人,其中55岁以上老年人有292人,占40%。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举都是呈报册中登录的数字,与实际死亡人数有一定的差距。

② 《清圣祖实录》,卷135,第16页。

③ 实际上死于医院、监牢、教养院、习艺所或倒死街头和由教堂出殡的人中,大部分也属于病故,但因没有报称病名,无法包括在内。

医学称谓相吻合。但多数病名还是沿习传统中医学的叫法。有的穷苦人因请不起医生,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在灵柩出城时,家里人只好报个大体相近的病名。还有一些像吐血、热病、上吐下泻,只能说是得病的症候,而非病名。类似此等以中医学命名,或在中医学看来也不规范的死亡名称,总计不下40余种。为了使列表简单明了,在统计时有的做了适当的归类(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死于癆症的人数最多,为1101人,占43.67%,如果加上杂癆等癆病,人数更多。癆症是导致当时中国人死亡的主要疾病,并且影响了一些人的正常嫁娶。统计显示,在62名20岁以上未婚死亡女性中,有48人死于癆症。根据笔者对清代17174个女子初婚年龄的考察,她们的平均婚龄是17.28岁,其中19岁前成婚的有15164人,约占88.3%(郭松义,2000),而北京又向

表3 各种病死亡人数统计

病名	死亡人数(人)		合计 (人)	病名	死亡人数(人)		合计 (人)
	男	女			男	女	
癆症	518	583	1101	食积	9	7	16
瘟症	236	158	394	暴病	15	1	16
老病	176	191	367	吐血	11	4	15
痧症	77	61	138	痢疾	9	5	14
痰气	63	57	120	霍乱	6	4	10
月经病	—	42	42	肝气	3	7	10
抽风(惊风)	23	14	37	上吐下泻	5	4	9
产后	—	35	35	下痢 ^②	4	3	7
杂癆	14	16	30	疯癲	6	1	7
疮癆	17	8	25	时瘟 ^③	5	—	5
喉症	5	19	24	黄病 ^④	4	1	5
天花(痘症)	10	11	21	牙疳 ^⑤	3	—	3
鼓症 ^①	8	12	20	其他	27	7	34
伤寒	14	2	16	合计	1268	1253	2521

注:①各种原因引起的腹水,如肝硬化、肝癌等。②指肢体筋脉手足痿软无力,日久致肌肉萎缩(多发性神经炎、急性脊髓炎、进行性肌萎缩等)。③时疫指一定季节或季节内的传染性流行性疾病。④黄疸性疾病。⑤急性化脓性或坏死性齿龈炎。

有的,都笼统称为老病。根据呈报书中的记录,报称老病的,少数在55~60岁之间,多数高于60岁乃至七八十岁的老人。因痧症致死的占第四位,因染痧症死亡的,14岁以下儿童占有很高的比重,为138例的55.79%。宣统二年四月初四,居于东单附近的总布胡同祥姓家庭,一天之内同时抬出3具棺材出城殡葬,而且得的都是痧症,说明它有一定传染性。呈报书中载录由痰气致死的有120例(男63例,女57例)。患此症者多数系中年以上,14岁儿童仅1例。

表4 按年龄比较因月经病和产后死亡妇女人数

年龄 (岁)	死亡人数 (人)	月经病		产后死亡	
		人数 (人)	所占比例 (%)	死亡人数 (人)	所占比例 (%)
20~24	128	18	14.06	10	7.81
25~29	112	11	9.82	7	6.25
30~34	91	4	4.39	7	7.69
35~39	81	4	4.94	7	8.64
40~44	56	4	7.14	2	3.57
45+	74	1	1.35	2	2.7

有“俗早嫁娶”的说法^①。照理,在这些20岁后死亡的未嫁女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已可成双配对,但疾病特别是带有传染的癆病,不但使其无法论及婚嫁,而且失去了生命^②。

在死亡病因中占第二位的是瘟症。因得瘟症而死亡的有394人,占总死亡数的15.68%,其中14岁以下儿童填报瘟症死亡的有84人,为这个年龄段死亡数276人的30.43%。老病严格说来不算疾病。只是按中国习惯,有的老者死亡无明显症候或痛苦,也有的家属忌讳谈老人的病因,为图吉利,对因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或老年性痴呆而死

在表3所列的病名中,有的主要集中于儿童或专指妇女。导致儿童死亡的疾病,除前面说到的瘟症、痧症,另如在37起抽风或惊风病中,有36起发生于14岁以下儿童,占总病例的97.3%;24例喉症,儿童有11起,占45.83%;21例

① 光绪《顺天府志》,卷10。

② 若按年龄段加以对比排列,便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20~24岁未婚死亡女子32人,占同年龄段死亡数128人的25.78%;25~29岁未婚死亡女子11人,占同年龄段死亡数112人的9.82%;30~34岁未婚死亡女子8人,占同年龄段死亡人数(91人)的7.69%;余下11人为35岁以上女子。

天花和痘症,9起是儿童,占42.86%;3例牙疳病,也有2例是儿童,占66.67%。专属妇女的疾病则指月经病和产后死亡两种。根据呈报书统计,因月经病死亡的妇女有42人,大多在20~29岁。可见此病对青年妇女造成的威胁不小(见表4)。

产后死亡共35人,若单纯按人数来看,造成妇女产后死亡的以20~24岁组为最多,因为这正是女性婚后第一胎的出生高峰期,而妇女生育第一胎的危险系数比生其他胎次要大得多。如果从产后死亡占此年龄段总死亡人数的比例进行考察,除25~29岁段较前有所降低,40岁后因妇女已处于生育末期,无论是死亡人数,或是所占比例,都大大下降了,值得注意的是30~39岁间的比例仍居高不下。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此年龄仍属生育旺盛时期,还有随着妇女年龄的逐渐增大,生育第一胎的危险也在增加^①。把妇女得月经病死亡和产后死亡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可看出二者对中青妇女的危害。

考察宣统元、二年北京城内的人口死亡,主要是起于疾病。在疾病死亡中,又以癘症和瘟症等细菌性传染病所占比重最大。癘病等细菌性传染病死亡人数居高不下,在当时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然而作为大城市北京的某些特殊环境,使其更显得突出。如人口密集,街道胡同住房相互紧贴,多数市民居住条件差,加上冬季漫长,一年内有将近半年须紧闭门窗,室内空气流通不畅,又缺乏起码的防护措施,导致细菌性传染病比农村等地更易流行扩散。

五、小 结

宣统元、二年北京内外城包括无籍但长期居留于此的人口在内,约为845 442人。又据呈报书载录推算,这两年的死亡人数是13 650人,年死亡率为16.14%。这个死亡率在今天来看诚然偏高,但若与1938年全国死亡率28.2%相比(刘铮,1983),却太低了,尚需修正。在死亡人口中,0~4岁比例最高,然后呈现的曲线是由低逐渐转高,至55~69岁达到峰点,随后又向低处回落。若按性别加以分类,0~4岁不计,女性20~34岁死亡比例最高,男性则在45~46岁之间。到了65岁以后,女性的死亡数又明显多于男性,反映在高龄人群中,妇女的存活比例要大于男子。

在死亡原因中,自杀、他杀及事故性死亡所占比重很小,绝大多数属于疾病致死,其中又以癘症为最多,其他像中青年妇女因做产和得月经病导致死亡,乃至集中于儿童的抽风、瘟症等病的频发,表明当时北京医疗水平和大众卫生保健条件较差。这与政府关心投入不够,各种举措基本处于被动无奈状态是有一定关系的。

笔者只是对北京城人口死亡情况的一个个案进行分析,且数据不完整,有的还具有一定的推测性,是否正确合理,尚待贤者发掘更多的资料,进行更精确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鞠德远:《清朝皇族宗室与皇族人口初探》,载《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第437~438页。
2. 郭松义:《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
3. 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
4. 刘铮等:《人口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02页。
5.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201~202页。

(责任编辑: 朱 犁)

^① 根据刘翠溶(1992)对清代50个家谱36 986个长子出生时母亲年龄的统计,以20~24岁年龄段为最高,计1 4864人,占整个总数的40.19%;与此同时,30~34岁和35~39岁的长子出生率仍有3 948人和1 732人,分别占10.67%和4.68%。